

第一章 生产力论

第一节 生产力——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生产力的概念

一般认为，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最早明确地使用生产力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他在其《谷物论》中写道：“和庞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①。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也都对生产力有过重要的论述。斯密把生产力和社会分工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生产力的概念，诸如“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未来生产力”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把生产力问题提到基本理论问题的高度，加以系统论述的人要算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生产力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一思想的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李斯特批判古典经济学派把生产力只看作是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

^①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69 页。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5 页。

属因素的观点，明确地提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① 这表明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价值”（实际上是生产关系）作为经济现象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李斯特是生产力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李斯特还反对古典经济学派只把体力劳动看成生产力的观点，认为生产力也应包括脑力劳动、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和管理。他写道：“那些养猪的和制丸药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性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② 李斯特强调脑力劳动在生产力中的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思想，也是极有价值的。此外，李斯特还把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认为物质生产力包括“工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商业生产力”等，精神生产力包括艺术和科学、教育、文化、国家政权与社会制度等，这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李斯特还按照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狩猎或野蛮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联合和农工商阶段等不同时代。这种划分不能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马克思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在多种涵义上使用了生产力概念。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的是“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资本论》中，较多地使用“劳动生产力”的概念，有的地方还用“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等概念。有时，马克思还在生产资料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如说：“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③ 马克思还使用过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22 页。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2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2 页。

“个人生产力”和“集体生产力”的概念。在谈到“结合劳动”与“个人劳动”的区别时，马克思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有与“社会生产力”概念相对应的“自然生产力”的概念，他所说的自然生产力就是各种自然条件形成的自然力被劳动利用所产生的一种创造财富的能力，与“物质生产力”概念相对应，马克思还有“精神生产力”概念。在 1857—1859 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讲到封建关系的解体时写道：“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② 在讲到科学时，马克思又写道：“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③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马克思如上的多种关于生产力的用语，目的在于表明生产力本来是一个涵义极为丰富复杂的概念，任何对它的简单化的规定都只能陷入片面性。

然而斯大林却硬要给生产力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社会的生产力。”^④ 毛泽东则说得更简单：“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⑤ 自从这样的定义一提出，生产力的两要素论就成为前苏联和我国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特别是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50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第 34—35 页。

^④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5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19 页。

经济学的兴起，关于生产力概念问题的研究，形成空前的活跃局面。就目前而论，主要有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传统的要素论观点。在持要素论观点的人中，有的仍坚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要素论，有的主张三要素论，即认为构成生产力的要素除过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外，还应包括劳动对象。三要素论在学术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有的人主张五要素论，即在三要素之外，又加上了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两个要素。有的主张六要素论，认为现代生产力由材料、能源、信息、工具、基础设施、劳动者构成。有的还把教育也包括进生产力构成要素中，主张七要素论，其实，如果有人愿意，还可给生产力加上别的因素。

第二种观点，是系统生产力论，即认为“生产力不是生产诸因素的机械相加，而是这些因素按一定结构组合起来的有机整体。”^①

第三种观点，是场态生产力论。这是潘德冰教授在其《场态经济学》这一著作中提出的一种新观点。他写道“所谓场态生产力，乃指生产力场所具有的支配和控制自然界的一种社会功能（或能力），或者说，是社会场态与参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所有事物相互作用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支配和控制自然界的社会功能（或能力）”^②。

上述的三种观点，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深度和发展水平上反映了生产力。特别是场态生产力论，它强调生产力是一种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因社会场的作用而放大或缩小。但是，这三种观点，都未能突破对生产力的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这种传统观念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在社会与自然界的

熊映梧主编：《生产力经济学原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3 页。
潘德冰：《场态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4—175 页。

关系中，只讲自然界适应社会需要，而根本不计社会对自然界的适应。要克服这种片面性，必须对生产力有一个新的理解。

前面我们引述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这样两对相互对立的概念，这就提示我们要科学地理解生产力，必须从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上去理解。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布哈林曾对生产力下过一个定义，他认为：“生产力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标志”并且从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上来考察生产力，又把生产力看作是“这种平衡的精确反映”。^①应该说布哈林的定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解生产力的正确思路。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原因，他的这一正确的思想令人十分遗憾地被埋没，被后人所遗忘了，直到三分之二世纪之后的今天，才得以重新放射出它的光辉。

关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统一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作专门论述。在这里，且先沿着布哈林的提示所指的思路，从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上来谈谈生产力概念应具有的新内涵。

传统的生产力观，不论是要素论，还是系统论，亦或场态论，都是以人类中心论为出发点理解生产力的，把生产力只理解为人类社会向自然界无限索取的能力，而不同时理解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界必须有所补偿，维护和保持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能力。因此，它片面强调社会征服、改造自然，使自然界不断满足人类无止境的需要，而忘记了人类也必须服从和适应自然界。这种生产力观是工业文明的思想反映，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已使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整个人类时代，由于自然是历史地与人类社会冲突着，作为人类生存前提的自然界必然有它的社会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正是

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由此，生产力就构成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社会和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一个永恒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运动作为一种客观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凭借生产力在解决自然和社会的矛盾中，创造了人类与自然共有的历史。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步的历程中，已经走过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阶段，现在，正在向着下一个大的阶段，即生态文明迈进。与这三个阶段的文明性质相适应，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也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情形。或者，可以倒过来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的性质。

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尽管也有个别的思想家，如中国先秦时期的荀子提出过“制天命而用之”的控制自然的思想，以与因循自然的“无为”思想相对立，但是就整个文明的性质来看，是自然主义的文明观占着统治地位。对自然的依赖，顺从和崇拜成为人们在解决社会与自然的矛盾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居于支配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狭隘的关系。”^①这种对自然界的依赖、顺从和崇拜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形成人对人的依赖、顺从和崇拜，而这就成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而且，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统治着人的社会存在，同时还支配着以这种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宗教、道德、艺术和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

工业文明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展开的，它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或人本主义的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再是社会依从于自然，而是自然必须满足人类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5 页。

会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①

因此 当弗兰西斯·培根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时，人们就把这看作是人类福祉的不竭的源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理性过分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作用。通过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获得无穷无尽的财富以使经济不断地增长观念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科学技术的每一成功都进一步加强这一观念。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由此认为近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控制学，科学对自然的控制是一项实用事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依靠科学技术使他们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飞速增长，但同时，由于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过度地开发自然，造成世界性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严重问题，把人类引向了困境。自然的反抗预示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的扩大存在着自身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意味着目的不可避免地选择的手段所破坏。这种消极方面，如果说在前几个世纪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到了 20 世纪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征服自然”意识的无限扩张，使人们曲解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实在，致使在追求征服自然这个目标的同时，人类没有意识到作为人类生存前提的自然界不仅仅是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第 393 页。

发利用的对象，而且同时是人类生存的有效环境，失去这一环境，人类将无法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因此，人类必须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得相互和谐。

历史发展到今天，必须从一种新的文明观出发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新的文明必然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进化的生态文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①在这里，马克思说明了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过程，其目标就是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而且也在最无愧于自然，并最适合于自然的特点下进行。^②

这样，作为把社会与自然联系起来，成为社会和自然共有的历史的基础的生产力，就必须进行历史性的重新界定。改变过去那种把生产力理解为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化经济行为的准则，理应着眼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一致。这样来理解的生产力应是协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它既包括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使其向人类社会作出奉献的能力，也包括人类保护和完善自然，使其从人类社会得到补偿的能力。这就要求现代的人类建立新的人口观、自然资源观、生态环境观、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7 页。

参阅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6 页。

发展观和社会进步观，并把这种观念协调统一起来，形成完整合理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取代过去那种单一地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观念。

二、劳动史、经济史、社会史的一致性

劳动史、经济史、社会史的一致性的展开，实际上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详尽而系统地论述三者的一致，当然不是我们这本关于经济哲学的著作的任务。但是，为了说明生产力是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这一命题，我们又不能不从三者一致谈起。

恩格斯曾把由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哲学称之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①。这就明确地确立了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点恐怕是所有真正马克思主义者都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称他们自己的哲学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因为他们正是通过实践把自然界纳入与人类社会统一的历史之中，从而使实践也成为社会和自然界共有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时写道：“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②。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劳动史、经济史、社会史三者一致思想的确切而概括的表达。

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核心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把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动提到了核心的地位，因为劳动是实践的最基本的形式，或如卢卡奇所说的是社会实践的模式。恩格斯在谈到劳动如何推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说：“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①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被卢卡奇所继承并用以构筑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体系。他认为：“构成社会存在新本质的所有规定性，都总括地包含在劳动之中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劳动当作一种原始现象，当作社会存在模式加以考察；澄清这些规定性就会使我们获得关于社会存在基本特征的清楚图像。”^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立唯物史观而写的一系列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可以说都是从劳动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三者一致的基点上展开他们的理论思考的。由于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异化”、“人道主义”这样一些概念，因而过去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这些著作的伟大的理论意义受到了一些自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轻视。在他们看来，使用这些概念表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还未形成。其实，如果不是表面地而是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涵义和内在逻辑来理解的话，应该看到异化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十多年来，一直进行卢卡奇思想研究的我国学者张西平认为异化概念始终是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重要范畴。他在引述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之后写道：“从宏观上讲，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页。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一个历史发展的图景已经勾画了出来，从异化劳动向前考察是一种社会形态，从异化劳动向后考察必然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这样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中枢，以研究私有财产为目标，就真正找到了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①应该说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是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底蕴。

下面我们根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的初步理解，简略地谈一谈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对劳动的分析把劳动史、经济史、社会史三者统一起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生产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关系上考察劳动，揭示出人类劳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形态：自然劳动、异化劳动和自由劳动。

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劳动指的是人类在跨入文明时代以前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特点是两种自然力的简单结合，也就是劳动者由于生物学的生存而具有的自然能力和进入劳动过程的物质资料由于自身的自然属性而能被利用的能力的结合。马克思在描述这种劳动时说：“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就表现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是他的前提。”^②恩格斯曾把人类史前时代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个大的阶段，每个大阶段又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小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生产劳动情况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描述。他在总括人类史前时代的生产劳动时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

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170—17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7 页。

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①。与自然劳动相一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社会的经济必然是公有制的自然经济。对此，恩格斯也有很好的描述：“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②

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本质，它是和私有制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解释异化劳动的实质时写道：“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③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异化劳动是因分工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从而出现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随着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带来生产者与自己的产品的分离，使他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结果了。”“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这样，“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92页。

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必然性来摆布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偶然性中存在着支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时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①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明白异化劳动是贯穿于整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的劳动形态，商品经济的所有规律都是发源于异化劳动的。所以，马克思曾指出，可以借助异化劳动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在商业、货币、资本任何一个范畴中都可以发现这个原始范畴的展开了的表现。”^②

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的社会形态，从而也就使异化劳动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达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存在的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普遍的异化。在这种普遍异化中，奴役别人的人也是不自由的。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普遍的被奴役情形时写道：“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甚至当这种专门技能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③

然而，任何事物一旦发展到它的最充分的形态，也就预示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1页。

它的否定已临近时日。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异化劳动达到了顶点，同时也使与劳动对立的资本产生了异化，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表明，资本也不再是由资本所有者随意支配的东西，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反而支配起资产者。这样，私有制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由社会占有资本和劳动，从而扬弃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自由劳动则是对异化劳动的否定，它是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劳动是在对生产资料总和的占有条件下，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才能的自主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再生产的统一。在这种劳动中，人们不再是分工的奴隶，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从事各项工作，他上午可以捕鱼，下午可以打猎，晚上可以写作。劳动不再是人们借以维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本身的第一需要。恩格斯在描述自由劳动阶段上人类社会生活的状况时写道：“人们周围的 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这样的社会，只能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

通过以上的简要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史、经济史、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3 页。

会史三者的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所在。那么，三者一致的基础是什么呢？这一基础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生产力，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的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社会的整个面貌，都是由人们如何处理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矛盾决定的。因而，生产力是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

三、生产力标准——社会主义的实践纲领

从理论认识上来说，生产力是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那么，从社会实践上来看，生产力自然应成为人们的一切历史活动围绕其旋转的轴心。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① 这意思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源泉和动力，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活动，归根结底都以发展生产力为归宿。然而，在以往各个社会中，人们都是不自觉地、盲目地创造历史的，因而，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即使在他们进行着经济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只以达到自己最切近的物质利益为目的，而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活动对生产力的发展，并进而对社会的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至于非经济领域的其他一切社会活动，则都被看作是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毫无关系的，完全受人们意识支配的单纯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的历史这一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就被完全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被看成是没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10页。

有任何规律性可言的，纯粹由人们的随意活动而形成的偶然事件的堆积，或由某种历史之外的精神力量所安排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以往的历史观的根本错误时精辟地指出：“过去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而这些是必须凭借一定的生产力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得到满足的。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把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看作是“世俗”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中去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年德国史学界那种轻视生产发展史研究的学术气氛表示极大的不满，说德国人“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②

在唯物史观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间，对它的种种攻击曲解从未间断过。来自资产阶级学术阵营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公开打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旗帜，以种种说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科学性。比如，被西方哲学界称为“现代德国哲学之父”的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就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创造，在这里不可能像在自然界中那样存在什么因果性和必然性。因此，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 页。

社会历史领域一切都是个别的，相对的，不可能有人们对任何客观的普遍的动力和规律的认识，所能有的只是各个人对自己境遇的“直接感受”和内心的体验。其后，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宣扬所谓“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经常是一种艺术作品，如同诗歌和道德意识一样，无任何规律可寻。”^①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科林伍德甚至把历史说成是“一场即兴演出的戏剧”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著名的英国现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则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知识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无法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认为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②在上举这些思想家的历史哲学中，全然没有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写出《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的罗斯托虽然把物质生产也纳入历史之中，但他却不认为它是历史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是主张在社会发展中，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相互关联地在同等意义上起着作用。

按理说，在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创造历史，理应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过，无产阶级在争得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领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就曾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中心地位，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

① 克罗齐：《史学与道德理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9 页。

② 参阅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 页。